

全 球 化 译 丛

全球化与道德重建

（德）彼得·施密特 著 胡万昌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Helmut Schmidt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OFFENTLICHEN
MORAL
GLOBALISIERUNG

© 1998 by Deutsche Verlags – Anstalt GmbH, Stuttgart

德国 Deutsche Verlags – Anstalt GmbH 出版社授予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简体字版专有版权。中文版
根据 1998 年版译出。

《全球化译丛》总序

亚洲金融危机后，特别是在我国政府即将加入 WTO 之际，国内学术界对全球化的研究迅速成了热点。从 1998 年我们主编国内学术界第一套《全球化论丛》后，在不到 2 年时间内，国内出版的关于全球化的编著和译著不下数十种之多。这不仅表明人们更加关心全球化问题，也表明对全球化的研究正在进一步深入；不仅表明国内学者对全球化的研究在深化，也说明国外学者对全球化的研究仍在向前推进。

薛晓源同志主编的这套《全球化译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90 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在全球化研究方面的最新发展。这套译丛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它的多学科性。译丛第 1 辑由 5 本著作组成，它们分别从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角度，对全球化问题做了广泛的探讨，这是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全球化进程所做的多学科反思。然而在这个共同表征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东西。细心的读者在研读完这 5 本译著后将会发现，这套译丛比较全面地体现了目前在全球化理论研究方面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特点。

首先是全球化研究的跨国性。全球化研究始于西方发达国家，但现在，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化都成了一个共同的话题。全球化是一项真正的跨国研究（transnational studies），或者说是一种真正的超国理论（supernational theory）。

其次，全球化理论的综合性。全球化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但是归根结蒂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发展过程。无论人们愿意与否，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展开，文化、艺术、伦理、学术和政治的全球化过程也或多或少开始出现了。与此相适应，全球化理论具有很大的综合性，至少包括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社会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等基本内容。

再次，全球化理论的包容性。全球化理论是各种政治倾向和学术倾向的一个交汇点，它不同于其他带有某种单一政治或学术倾向的理论，如新左派或新右派理论、现代化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社群主义理论，更不用说自由主义理论、保守主义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在全球化理论中我们可以听到具有上述各种政治或学术倾向的学者的声音。

最后，全球化理论的内在矛盾性。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相应地，在全球化研究中，充满着各种对立

的观点。有人把全球化当作福音，有人则认为它是灾难；有人把它视为人类的出路，有人则将它看作是我们的陷阱；等等，不一而足。

全球化理论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全球化研究将是 21 世纪很长一个时期内各国学者的共同课题。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不仅意味着努力融入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也意味着更多地参与国际学术讨论，在诸如全球化这样的重大理论问题上，能够更多地听到中国学者的宏亮声音。希望这套译丛的出版，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全球化研究，我想，这也是丛书的编辑者和出版者推出这套丛书的基本宗旨。

俞可平

2000 年 8 月 19 日于北京新风南里

目 录

中译者序	1
------------	---

上 册 全 球 化

——政治、经济和文化挑战

出版说明	2
一 全球化现象	3
二、政治挑战和经济挑战	22
三、文化挑战	51

下 册 寻 求 公 共 道 德

——面临新世纪的德国

前 言	76
一 堕落还是转变	79
德国人的种种恐惧	87

失 望	94
德国人的集体意识	96
转变是可能的	100
二、职能精英的责任	103
政治阶层的道德职责	109
教会的公共责任	121
法官、医生、教师和教授的责任	127
电视能够代替教育吗?	138
经营管理阶层的双重角色	142
三、经济是我们的命运	156
大量失业是个道德问题	159
虚假的“妙方”	166
结构革新的重点	171
1. 降低国家支出比例	172
2. 税收和补贴	173
3. 重新明确财政职责	175
4. 私人金融机构需要自律和监督	179
5. 梳理法规条款和审批程序	180
6. 建立灵活的劳动市场	182
7. 革新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	186
8. 我们需要尖端技术	191
必须重新启动振兴东部的过程	196

四、崇尚道德的勇气	200
自由权	201
义务和责任	208
美德是不可或缺的	218
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训练	227
五、一个全新的世纪	235
新的力量对比格局	239
欧盟存在的必要性	244
各种宗教和文化之间必须相互尊重	251
附 录	263
世界人类义务宣言	263

中译者序

本世纪 60 年代以前，虽然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日益加强，但是，人们的活动和思想仍然局限于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70 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动摇了世界经济结构，也改变了西方人对世界社会的看法。人们认识到，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全球共享的空间，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发展能够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重大影响，民族国家式的政治调控能力在某些场合是不够的。面对全球化的趋势，世界各国都在寻求应变办法，不同的党派及政界、经济界的首脑人物也都通过不同途径表达了自己的主张。

1975 年 11 月，西方六国首脑会集于法国朗布依埃，着手讨论如何克服西方国家因衰退而可能出现的危机，同时试图在政治、经济上达成协调一致的行动。这次会议是西方国家有意识地对政治、经济问题做出全球性反应的开端。本书的作者、联邦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就是这次会议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可以说施密特很早就意识到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意识到提出新的对策的必要性。

· 赫尔穆特·施密特，1918 年 12 月生于德国汉堡，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长期担任汉堡市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起当选为联邦议会议员，1958年进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1968~1984年任副主席；1969年参加勃兰特政府，历任联邦国防部长、财政和经济部长等职。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施密特于1974年勃兰特辞职后接任联邦总理，任期内在反对恐怖主义、实行务实的经济政策稳定国内经济、建立欧洲经济体系和谋求国际和解等问题上发挥了关键作用，赢得国民信任，于1976、1980年连任；后来在经济衰退期间因拒绝削减社会福利事业而失去自由民主党的合作，于1982年辞职，此后一直从事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研究，现为德国《时代》周报主编之一。施密特思维敏锐，对新问题极其敏感，其丰富的政治经历和对世界政治、历史的熟稔使他对许多问题有独到的见解。

在政治、经济政策方面，施密特是个务实的政治家和政论家，自称是“保守的社会民主党人”。鉴于贸易和资本流通自由程度的提高以及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民族国家的塑造能力受到削弱，个别国家的调控能力往往无法奏效或者适得其反，施密特主张在较大的范围内达成某种一致性的政策，实现对金融市场的真正调控。考虑到世界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施密特赞同维持合理的“均势”，认为这样做有助于建立和平的世界秩序，也有利于保护各国的利益。出于对欧洲各国利益的考虑，施密特主张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和实行单一欧洲货币；在思想文化方面，施密特承认各种文明、文化本身的意义，主张促进不同文明、宗

教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理解。为此，施密特甚至同一些国家的卸任总统、总理一道，组成了一个旨在促进人类义务意识的普及的国际行动委员会，并且发表了关于人类义务的宣言。

本书是一部政论性著作，源自作者的两本书：一本是《全球化——政治、经济和文化挑战》，主要论题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及其应对策略；另一本是《寻求公共道德》，论述的是全球化条件下社会各界的责任或义务。鉴于内容上的连贯性，征得原出版者的同意，现将其合在一起出版。

近年来，大多数有关全球化的著述都着力于探究全球化的内涵和影响，关于全球化的论争亦主要集中于如何界定全球化，如何考察全球化的动因，以及怎样看待全球化的结构性影响等方面。与上述著作不同，施密特在本书中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全球化定义，他的目的也不在于界定什么是全球化及其所包含的内容。相反，施密特试图通过描述全球化的种种表现来提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新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

全球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施密特看来，虽然世界经济早在马可·波罗时代、达·伽马时代、哥伦布时代就已经存在了；但是，与过去的时代相比，在 20 世纪的进程中，世界五大洲之间、近两百个国家之间的交融和交往发生了质、量两方面的重大飞跃。现代交通、贸易、通信和金融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整个世界在 20 世纪的变

化之大是它在 19 世纪所发生的变化无法比拟的。全球化至少表现于以下方面：世界性的人口爆炸；参与世界经济的国家日益增多；贸易、资本流通和金融流通的自由程度迅速提高；技术进步及其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劳动岗位从传统工业国家转移到新兴工业国家；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各种文化、文明之间存在着发生冲突的危险。

施密特认为，全球化既是一个实践—政治话题，也是一个社会—经济话题，还是一个思想话题。受全球化的影响，除了原有的问题有待解决以外，包括德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目前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方面都还面临着一些新问题，如：

——如何遏制人口爆炸继续延续的势头？由谁来采取行动？应采取哪些手段？

——如何防止世界人口增长和工业化程度提高给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破坏，譬如避免全球性的温室效应？这样做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谁来支付这笔费用？

——我们需要一种世界范围内协调一致的能源政策吗？

——必要时可以通过联合国的军事干预来阻止、结束战争和内战吗？如果联合国的行动因否决权的原因受阻，地区性的安全组织，譬如北约，可以或应当进行干预吗？如果某个国家发生内战，可以对它进行外力干预并损害其主权吗？或许至少在遇到种族灭绝行为时可以这样做？谁来做出决定？谁派遣士兵？

——如何阻止武器和战争工具的交易？如果裁军取得

成效，又将如何解决美国、欧洲、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数百万军工产业的雇员所面临的问题？

——如何制止核武器的扩散？如何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最终裁减其庞大的军火库？

——如何制止大规模的移居潮和难民潮？哪些措施是容许使用的？

——全世界能够并可以使用哪些手段来防止新型的、借助新技术进行的跨国犯罪？如何对付国际恐怖主义？

——由于经济和技术的全球化给不同国家带来的机遇和风险不一样，哪些防范风险的措施是必要的，哪些是应当禁止的？

——鉴于上述大量问题，欧盟的任务是什么？各成员国的任务是什么？我们能够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吗？

——我们必然会遇到“文明的冲突”吗？怎样做才能防止世界观、宗教或文化方面的冲突的扩大，乃至引发战争？

施密特指出，由于当代参与世界经济的国家日益增多，各种形式的交往和相互影响日益密切，全球竞争的局面已经展开，因此，无论这些问题是如何形成的，都应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加以解决。

从政治、经济方面看，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挑战，任何个别的或片面的解决办法都无济于事，重要的是各方乃至各个国家共同努力，释放社会上迄今受到过分约束或限制的首创精神和创新力量。针对全球化对

民族国家界限和能力的客观挑战和超越，施密特从 7 个方面论述了应对措施。归结起来，这些措施可以分为 4 类：

首先，疏理法律和放松调控，精简国家的职能，明确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责。过于繁琐的法律条文和审批程序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削弱了个人的自我责任意识，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结构性障碍。应当根据辅助性原则和民主制原则，精简国家的职责，把决策权力尽量多地托付给下级部门和个人。可以借助相应的契约关系取代管理部门的约束办法。

其次，改革税收制度，明确财政职责，建立公正、透明的税制。改革税收制度的原则应当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明确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责。应当出于增加财力和刺激投资活动的目的对用于再投资的利润少征税，而对用于分配的利润或其他个人收入多征税；改变税收不公的弊端，提高对资本收益的征税，相应地减少劳动要素的税收负担，堵塞不合理的税收漏洞，取消过于泛滥的税收特惠和补贴，使税收真正在经济上和社会心理上发挥维护社会公正的导向作用；与在其他方面放松调控的做法不同，对私人金融机构的活动应当加强监督，并通过一些国际性的规则来维护金融流通的安全。

再次，改善社会保障体制，建立灵活的劳动市场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是现代社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然而，在西欧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还承担了一些与保障无关的职能。巨额的社会保障支出导致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劳动

岗位外移，失业率上升，而失业率上升反过来又要求社会保障部门扩大支出，形成了一个怪圈。因此，一方面要放弃超级福利国家的幻想；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出现“有工作的贫民”这样一个下层社会。应当明确社会保障事业的责任范围，把那些与保障无关的职责分离出去，减轻社会保障部门的负担，同时要把社会保障费的增幅与社会经济增长的速度联系起来，防止社会保障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当然，维持社会保障事业和经济正常发展的根本性因素是提高就业水平。应当通过立法手段改变僵化的劳动市场制度，赋予中小企业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从而增加就业机会。

最后，鼓励科学研究，刺激创新活动。克服结构性失业的前提是在前沿技术领域增设劳动岗位。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由于比较工资成本优势和技术传播速度加快的缘故，劳动岗位无可避免地转移到低工资国家，这就给所有国家，特别是传统工业国家造成了竞争压力。因此，社会各界都应当尽快了解研究和开发的重大社会经济意义，意识到技术零增长的后果，改变对技术进步的种种恐惧心理。研究部门应当与企业界密切合作，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金融机构应当通过必要的措施扶持创新型企业的发展；立法机构则要消除不必要的法律障碍，帮助创立有益于创新的社会环境。

施密特着重指出，解决上述所有问题，除了需要上述政治、经济政策举措以外，还需要文化政策措施，需要达

成一些世界公认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基本准则。在本书的下篇，施密特着重论述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和道德的价值，社会各界的道德责任，以及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相互尊重的必要性。本书的特色恰恰在于它提出了如何建立全球化时代新的文化价值体系这一重大问题。迄今为止，研究全球化问题的著作还很少涉及道德、文化领域。

施密特看到，传统和意识形态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影响已经削弱，曾经被人们深信不疑的一些基本价值正在丧失。原因在于，电视和其他大众媒体工具产生了不利的作用，60年代“反权威运动”的消极影响依然存在，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随着“美国经济奇迹”的出现重新抬头，人们日益担心社会处境的恶化（失业率上升、社会福利水平下降）。然而，道德基本价值对人类社会的和平共处起着重要作用，其意义是法律规定无法取代的。如果缺少了道德基本价值，缺少权利与义务并重的原则，任何开放社会、任何民主制度都无法长期维持下去。

道德基本价值不是靠法律规定来确定的，它主要以榜样、教育、权威和领导为基础，同时还依赖于传统价值、原则和社会公理的传承。在过去，道德的传承是极其自然的事情，现在看来这种传承机制经常遭到破坏，道德价值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社会各界都应当勇于承担自己的道德责任。“使传统价值重新发扬光大的最佳土壤，便是在实践中身体力行的、通过榜样展示出来的美德”。

在民主制度下，政治阶层面临着双重的挑战：一方面

要在选民面前申明自己的主张，争取选民的信任；另一方面还要对自己的良知负责。政治决定涉及广大公众。政治家的责任在于对自己的行动或不行动的后果负责，政治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和途径不能同基本价值发生冲突。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都要考虑到自己的决定可能造成的后果及其解决办法。当利益要求与良知发生冲突时，应当根据良知采取行动。良知义务不是表面上对法律、准则的遵从，它是一种因认同基本价值而产生的义务，是韦伯所谓“责任伦理”意义上的义务。缺乏基本价值的政治必然是没有良知的政治。

现代社会的分化使各个社会阶层成为排他性的利益群体，而各个利益群体在采取行动（投票、决策等等）时往往更加重视自身的利益，因此，培养公共道德的关键是关心公共利益。应当把公共利益视为最高原则。由于教会、法律界、医学界、教育界和经营管理阶层对塑造社会也发挥着巨大影响，他们同样要意识到自己的道德责任，用自身的行动倡导社会道德。首先，他们应当争取公众的信任，使公众相信他们关心公共利益；其次，他们还应当根据各自的职业特点，提出一些自律性的准则交付公众讨论，并接受公众的批评。经营管理阶层扮演着双重的角色：他们一方面要根据经济理性获取利润，并以此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兼顾公众和整体的利益，不能靠避税、解雇员工、追求“股东价值”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良的榜样会导致社会道德的堕落。